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叙事隐喻： 情感框定与认知建构

曹德军

【摘要】作为叙事话语武器,政治“隐喻”将源域的意义映射到目标域。在抽象复杂的政治领域,政治隐喻可以干预受众的思维与认知,吸引观众注意力。隐喻有四种政治功能,即简化认知方式、意义填充、选择性框定与促进安全化进程。当面对复杂的世界时,隐喻可以作为认知过滤器,产生信息简化效果。隐喻是一把“双刃剑”,其虽然可能产生预期的修辞效果,但也可能诱导使用隐喻的修辞者自我约束。在竞争性话语环境中,国际政治的抽象术语和逻辑也经常通过隐喻来表达。在无政府状态下,外交叙事的修辞强制与隐喻表达提供了一种约束机制,对外交行动产生合法性压力与道义限制。在外交实践中,隐喻话语不仅是展示意图与塑造信念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或限制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手段。

【关键词】政治话语;叙事隐喻;历史类比;情感框定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国际关系研究》(沪),2024.2.69~9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5)的阶段性成果。

在政治博弈舞台上,叙事修辞是增强身份认同、促进利益整合、赢得公众支持的强有力武器。^①不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的互动进程中,每时每刻的话语交锋、沟通、冲突、合作与威慑,都需要修辞叙事作为承载。^②用美国学者萨利·米勒·吉尔哈特的话来说,“语言即武器”^③“语言是上膛的手枪”。^④外交叙事具有塑造利益偏好与身份认知的重要功能,无话语则无外交。^⑤实际上,外交叙事的修辞与隐喻表达提供了一种约束机制,对外交行动产生合法性压力与道义限制。政治隐喻既是一种认知聚焦、意义填充、情感激发的载体,也是进行政治安全化的修辞装置。依靠显见或默契的政治隐喻,政治家可以主动塑造舆论,强化行动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抽象复杂的政治领域,隐喻可以简化复杂性,

使抽象的问题变得容易理解。^⑥

一、审视政治叙事的国际话语功能

长期以来,外交叙事的合法性约束被国际关系学者所忽略。理性主义者指出,外交叙事是“廉价话语”,不具备可信度,^⑦只须观其行,无须听其言。詹姆斯·费伦认为通过自己“捆绑双手”,可以展示决心与诚意。^⑧理性主义者不关心外交叙事,仅仅认为昂贵信号是承诺运作的必要条件,所谓的“昂贵”则是投入足够的成本,让自己陷入其中而难以撤销。^⑨但是政治心理学学者反对按照成本界定叙事效力的做法。他们认为,即便无成本的外交叙事也可以传递意图信号,改变对方信念从而塑造其行为。有研究表明,即使在高度对抗的环境下,“廉价话语”也可能发挥塑造对方认知的作用。^⑩

爱丽丝特·米斯基蒙、本·奥洛本与劳拉·罗丝等学者开创性地分析了战略叙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其2013年出版的专著《战略叙事:沟通权力与新世界秩序》中对国际关系中说服与修辞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宽泛的理解与观察,其内容不仅包括军事对抗中的话语威胁,也涉及民间外交与软实力建设的语言表达。三位学者在2017年编著的《铸造世界:战略叙事与国际关系》一书中问道:战略叙事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理解叙事说服的关键在于分析观众认知与反应,但叙事传递会遭遇观众何种程度的抵抗?在什么条件下,观众会认为叙事是具有说服力的?为了刻画战略叙事的说服力光谱,三位学者从多个维度考察战略叙事的生成、投射与接收问题。^⑩一般而言,战略叙事在三个层面上运作:(1)国际体系层面的叙事表达。例如,政治行动者公开表达自己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的理解与态度,或围绕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展开话语辩论;(2)政策层面的叙事构建。行动者根据议题性质施展话语影响,例如在国际谈判、军事威胁与危机沟通之中,用话语修辞改变博弈结果;(3)身份认同层面的叙事分析。行动者在国际事务中投射认同,展示自我价值、信念与可信度。回顾既有文献,学术界对战略叙事的分析存在四种路径:理性主义分析、沟通行动理论、反思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些路径需要进一步批判性整合。^⑪

从概念内涵上看,叙事(Narrative)包括场景设置、因果关系、角色与情节四个要素。与之相关的概念有两个,其中话语(Words/Language)指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声音系统;而修辞(Rhetoric)是词语布局、语气调整与说服论证的微观话语技巧。实际上,叙事与权力、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难以分割。其一,权力通过叙事彰显。作为人们用来理解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权力,“生产性”权力与用来部署权力关系的语言相联系。^⑫权力不是某种可以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话语实践来行使的影响过程。政治权力本身可以被转化为话语。通过精细的修辞设计,战略叙事者会最大化包装其实质意图,将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听众。部分学者对安全话语的“象征性力量”进行了分析。^⑬米歇尔·福柯认为,政治权力永

远使用“一种无声的战争来重新确立这种武力关系,并将其重新纳入制度、经济不平等、语言,甚至个人的身体中”^⑭。基于此,福柯将话语与权力关系等同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吉尔哈特提出“语言即武器”。^⑮罗纳德·克雷布斯等人提出基于“修辞强制”的权力模型认为,通过压制对手的反驳空间,修辞可以迫使对手退到对修辞者有利的位置上。^⑯理查德·杰克逊认为,行动者“通过宣传自己、诋毁竞争对手的叙事修辞形成话语霸权”,一旦主导性话语成为公共辩论中的主导语言,异议的声音则很难被听到。^⑰此外,研究金融沟通的文献表明,中央银行官员的话语修辞直接影响市场走势。从工作简报、官方报告,到演讲、采访、政策声明和记者招待会,这些沟通方式直接塑造市场投资者的预期。例如,相关官员会向公众发出信号,表明其政策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低位,以刺激经济复苏。例如,1995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新经济”演讲和他在1996年的“非理性繁荣”演讲,皆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美联储权力运作的话语工具。^⑱

其二,叙事与身份相互连通。后结构主义者指出,事实依赖于主观意义的理解,而话语则赋予事件以意义。^⑲赫伯特·布鲁默在《象征性互动:透视与方法》一书中突出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叙事的影响。他强调指出,社会行动者使用故事来构建主观意义。故事是象征性的结构,塑造身份与情感。^⑳身份被定义为“一个连贯而充满活力的生命神话”。^㉑战略叙事涉及“谁的故事将取胜”的政治竞争。^㉒战略竞争者通过各种叙事形式凝聚共享的价值与情感认同,将当前的挑战、过去的失败和未来的胜利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设计出鲜明的角色和情节线索。^㉓由此,叙事可以让人们通过恐怖分子的眼睛看世界,了解是什么原因驱使他或她炸毁满载平民的公共汽车。叙事让观众产生“我和他/她一样”的共情理解。在现实关系中,叙事情节不仅定义了“我们是谁”“他们是谁”“我与他的关系”等认同问题,同时也框定了行为体行动的方式和导向。^㉔伽斯·乔维特和维多利亚·奥唐奈认为,叙事的说服力

来自听众的需求,激发听众的欲望和想象力可以塑造其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为了说服听众,叙事者必须将叙事与观众相信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一联系过程称为“锚定”。^②

其三,叙事激发强烈的情感反应。语言影响了人们的情感,外交叙事是塑造或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关键手段。^③在国际政治的话语竞争过程中,说辞策略的选择及其效果还受到受众构成、立场及关系分布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④情感在人类认知中发挥重要作用。情感是指个体为刺激物所赋予的积极或消极的价值,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分配先于理性认知。^⑤例如,一个关于无辜儿童死亡或大屠杀的恐怖故事可以激发听众的情感反应,这是统计数据和其他形式的论证所不能做到的。又如,向公众介绍武力干预的统计研究数字以证明干预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比不上叙述一个因外国干预而支离破碎的当地家庭的故事更有情感冲击力。叙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感反应,是因为故事将听众与情节中的价值或需求绑定在一起。^⑥概言之,叙事是身份、情感和实践的黏合剂,身份建立在有共同意义的叙事基础之上。政治语言中的修辞不仅仅是语言修饰的艺术,同时使政治语言成为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符号。^⑦

二、作为叙事武器的政治隐喻

“隐喻”是对话语的创造性运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将隐喻定义为“给事物一个属于其他事物的名称”。^⑧该定义涉及隐喻中的意义转移与“跨域映射”。作为一种认知手段,隐喻渗透在政治语言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理解抽象的目标域,隐喻者会借用更熟悉和具体的源域来降低理解难度。实际上,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隐喻表达,譬如将祖国比作“母亲”、将抗疫视为“战争”、将重大突破称为“里程碑”,或者使用“螺旋上升/下降”“灯塔”“界标”“试金石”等隐喻描述政治进程。通过将抽象的概念与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政治隐喻可以更为高效、简洁地传递信息,同时可以更好地触发情感共鸣。基于对现实信息的选择性筛选,隐喻框架突出局部信息,聚焦观众注意力,是政

治竞争的重要话语工具。

(一)隐喻的概念内涵

隐喻被看作是一种“跨概念域的映射”,即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⑨从源头上看,“隐喻”(metaphor)的词源来自希腊文“metapherein”,意思是“转移”或“传送”,即将某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⑩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把隐喻定义为“两个具有相似性或者经验关联性概念之间的映射”。^⑪其中,隐喻包括目标域与源域两大部分。目标域与相对抽象、复杂和不容易描述的概念相关,比如时间、感情等;而源域与具体、客观实在事物的描述有关,例如动作、身体现象等。当然隐喻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修辞者与听众之间的合作,即双方必须共享一些基本的知识或经验。^⑫例如,当一位修辞者将政治成就称为“里程碑”时,知道“里程碑”字面含义的听众就能理解这个形象的隐喻,而如果听众并不了解“里程碑”的基本含义,那么就不知道该词在这种语境下代表多么重大的政治“进步”。再如,“让贫困成为历史”就是基于时间概念的隐喻:如果想象有一天贫困可能属于过去,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努力追求没有贫困的未来。如前所述,情感反应也是隐喻修辞的话语效力之一,它促使观众形成一种情感共鸣。^⑬在安全领域,“国际大家庭”“反恐战争”“邪恶帝国”“贸易战争”“安全容器”等隐喻就可以框定国际观众的想象与情感。^⑭

一方面,政治隐喻可以干预受众的思维与认知,产生强大的政治传播效应。^⑮尼采曾用“隐喻的流动大军”来形容修辞话语的强大力量。^⑯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隐喻修辞就是权力的体现。通过隐喻,听众可以了解话语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例如,“试金石”隐喻指可以用来检验有效性的任何物理或智力度量,它被隐喻为政治中的“酸碱测试”。而“时代变革”被隐喻为“席卷世界的潮水”,并可能“淹没”陈规旧念。由此,这些生动的隐喻就在观众脑海中产生形象的想象投影。只要能通过嘴巴发出声音,隐喻就可以在彼此的脑海中产生精确的想象组合。^⑰另一方面,隐喻可以作为一种叙事标签,吸引观众注意力。隐喻是一种从其他角度看待事物的

手段,它用另一个领域的概念指涉当前的概念,以“如果—联系”为基础。^⑫例如,“布拉格之春”与“阿拉伯之春”等叙事标签,将“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运动隐喻为“春天”。“春天”作为源域,强调了在经历了严寒的冬天之后大自然的复苏和绽放。这个代表新生与繁荣的概念生动地描述了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趋势,以听众所熟悉的方式将这场抽象或遥远的政治运动呈现出来,而且暗示革命会像自然复苏一样不可阻挡。^⑬概言之,隐喻是一个棱镜或透镜,使听众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和理解周围的世界(见图1)。一个恰当的隐喻框架就像摄影机的相框一样,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认知与聚焦。^⑭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转喻,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所涉及是两个领域还是一个领域。^⑮“隐喻”可被视为两个领域之间的映射,而“转喻”涉及单一领域内的映射或认识对应。^⑯

(二)叙事隐喻的政治效力

从古希腊时期到罗马时代,隐喻修辞被视为是对事实的“花式”表达,如闪闪发光的优雅饰品,为普通语言披上了美丽外衣。部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隐喻是对朴实语言的“装饰性补充”。然而在柏拉图眼中,隐喻属于花言巧语,至多只是修饰性语言,在科学陈述中不宜使用隐喻。^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隐喻重新被学者们重视,并被视为思维创造的重要话语载体。整体而言,隐喻的政治影响体现为四种功能,即聚焦与简化认知方式、意义填充、选择性框定推理,以及促进安全化进程。

首先,隐喻聚焦与简化认知。隐喻作为修辞学的重要方法,是一种省略式的比喻,将重心聚焦在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方面,重新赋予事物新的理解角度。^⑱尤其重要的是,隐喻建构了一种类比思维,没有这种思维便无法对抽象的事物进行推理。乔治

莱考夫等人指出,“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⑲一方面,人们倾向于用具体的、简单的形式来理解抽象的、复杂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这样做是下意识的、受到语言的引导。由此,隐喻是社会现实的建构工具,人们借助熟悉的参照物,使抽象世界变得更加容易理解。^⑳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政治进程都与隐喻密切相关。例如,冷战初期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长电报”中称共产主义是“寄生虫”,呼吁提高对苏联威胁的警惕;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解释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的必要性时使用了“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隐喻。通过将源域“寄生虫”和“多米诺骨牌”的生动形象投射到目标域“共产主义”和“印度支那地缘政治形势”上,能够在观众脑海中建立起丰富而具体的认知图像。^㉑基于此,政治学语境中的隐喻可以被用于说服目的,它聚焦与简化认知,使理解抽象问题变得更加容易。^㉒

其次,隐喻可以作为意义填充手段。从语法角度看,与身份关系相对应的构词表达为“是—连接”,与隐喻相对应的构词表达是“若—连接”。身份建构过程总是隐含或阐释着一些“他者”,隐喻修辞将意义串联起来,使之成为一种身份认知的地图。^㉓战争的含义对一般民众而言是抽象而遥远的,通过隐喻载体,战争的政治意义就可以更好地被表达和传递。例如可以从积极维度将战争隐喻为“冲锋”“解放”“保卫家园”“光明”“重生”等;也可以从消极维度将战争隐喻为“黑夜”“疯狂”“毒药”“疾病”“死亡”等。例如,马丁·路德·金的反战演讲“超越越南”就将战争隐喻为国家灵魂的“弊病”。他呼吁道:“如果美国的灵魂被彻底毒死,尸检的部分原因则必须与越南相关。”^㉔因为越南人民“看着我们污染他们的水井,看着我们铲除了他们一百万英亩的庄稼”。^㉕他批评美国入侵越南,是“把仇恨的毒药注射到越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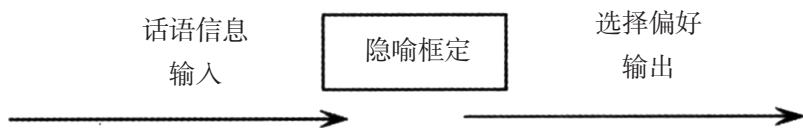


图1 隐喻框架聚焦认知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的血管里,是一条通往精神死亡的道路”。^⑤这样的隐喻使人联想到美国对越南带来的深切灾难。马丁·路德·金立足黑暗与光明、疾病与健康、死亡与生命、疯狂与理智、敌人与兄弟,以及犯罪与赎罪的二元式隐喻,清楚地向观众展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代价,呼吁“为弥补在越南的罪恶和错误,应该主动停止这场悲惨的战争”。^⑥这种道德性隐喻使国家形象拟人化,将话语聚焦在美国发动越战的合法性问题上。而如果不能治愈美国“病态的灵魂”,这场“噩梦般”的冲突将使战争制度永久化,对美国民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⑦

再次,隐喻发挥选择性框定功能。每个隐喻都在强化事物的某些属性而忽略其他属性,从而选择性框定公众的注意力。根据经典的框架理论,人们对风险的偏好取决于选择方案的框定范围。对政治隐喻者而言,隐喻效果取决于它们的描述方式。^⑧更重要的是,隐喻意象呼唤出人们对国家、社区、身份和其他价值的情感依附,如果不响应主流叙事的隐喻号召,就会显得丧失行动合法性。^⑨迈克尔·埃拉德指出,“反恐战争”这样的隐喻巧妙地“编码”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隐藏的恐怖组织成为被征服的目标,激发了观众对必然胜利的幻想。^⑩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用俄语的“dom”,即“家”的概念来表达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理解。“dom”传达的是由多个独立房间组成的公寓楼的概念,是对欧共体(欧盟)结构的隐喻。而德国政治家的话语则倾向于参照地基、屋顶、内墙等概念,将欧洲“房屋”的隐喻元素具体化。与之不同,法国领导人的话语风格则更倾向于将房屋隐喻纳入更抽象的“建筑”概念之中。^⑪不同国家对“欧洲之家”这一隐喻的表达存在着差异,这表明隐喻并不是带着固定的意义进行传递的,而是受语言习惯与情感认知约束。^⑫

最后,隐喻话语促进安全化进程。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框架,安全不是一个客观条件,而是一个通过话语叙事建构威胁感知的过程。^⑬大多数研究都认为,隐喻激活的框架影响了解释,并能影响人们对安全威胁的界定。当对手被隐喻为“野兽”时,观众就会不自觉主张捕获和控制“野兽”;当用

“病毒”隐喻犯罪时,观众也认为应该及时诊断和治疗“病毒”。与之相关的是,激活框架的隐喻通过一些创造性的话语标签,可以将对方“污名化”。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夺回控制权”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暗示着美国曾经是“伟大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夺回”和“再次”的话语框定了这些民族的历史地位;这种“含蓄”的隐藏逻辑,以怀旧的方式勾勒出一种情境,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口号。特朗普还创造了诸如“骗子希拉里”“腐败女王”“瞌睡虫拜登”等外号来诬陷他的对手。不论这种言辞是否与事实相符,特朗普的隐喻与贴标签式的话语框架,会在一些人心目中留下过目不忘的效果,久而久之就潜移默化地影响对被“污名化”对象的道德判断。

三、外交话语中的政治隐喻:联想、启发与叙事竞争

隐喻通过影响认知与情感来改变观众的主观信念。将抽象的问题通过形象化的隐喻来解释对政治受众来说更有价值,因为通过形象化隐喻可以将这些问题直观地、有形地、易理解地展示出来。^⑭例如,“铁幕降临欧洲”(丘吉尔所言)、“变革之风”(麦克米伦所言)或“血流成河”(鲍威尔所言),这些表达方式是非常有创意的隐喻,至今仍然成为冷战、非殖民化和移民争论中时常被引用的修辞模版。与类比和比喻相似,隐喻利用意象的生动性,通过比较来帮助观众提高情感共鸣能力与认知能力。^⑮

(一)隐喻的生动性联想

依靠显见和默契的政治隐喻,政治家可以利用隐喻的修辞力量来塑造舆论,设定或证明政策的合法性,以支撑行动。“如果克林顿是泰坦尼克号,冰山就会沉没”这一诙谐的反事实陈述,运用了泰坦尼克号沉没于撞击冰山的隐喻,将危机情景投射到了政治和社会情景之中。^⑯也有研究指出,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隐喻,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国家实力没有变,但是道义合法性却显著提升,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领袖。^⑰许多政治家和分析师也将南海进行历史类比。泰国前外交部长兼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担心南海可能会“成另一个巴勒斯

坦”,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称该地区是“21世纪的巴尔干半岛”,^⑥地缘政治学者卡普兰认为南海是不稳定的“亚洲大熔炉”。^⑦毫无疑问,在过去十年里南海局势的反复紧张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安全走向的风向标。上述生动性隐喻触动了人们对区域局势紧张的担忧心理。

一方面,隐喻的形象化表达更容易“占领”对方心灵。例如,中国睦邻外交将东南亚与中国描述为一个“大家庭”“走亲戚”“一家亲”,可以塑造出一种“家庭”的友爱氛围,传递出中国的善意。最关键的是,隐喻可以调动观众们的意义期待。又如,当中国将双边合作称为“里程碑”时,听众从这个隐喻中就得出对双边关系“进步”的期待。在“铁幕演说”中,丘吉尔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情感隐喻。他利用圣经中关于上帝通过划分语言来划分人的神话,强调了英国和美国人民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与英语文化,塑造出英美特殊关系的叙事。他使用“伙伴”“兄弟”隐喻,认为在和平旅程中美国和英国是永久的“旅伴”,基于此呼吁将英美关系视为民主世界稳定的基石,由此强化“团结”神话。另一方面,丘吉尔将联合国隐喻为“和平的殿堂”,以说服民主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参与全球合作。这种广泛运用拟人手法,将国家形容为“一个脆弱的人”,将战争和暴政描述为“掠夺者”的人格化隐喻带来了情绪上的直观感受,提升了行动合法性。^⑧

另一方面,精心设计的隐喻可以推进政治合作。在主权国家世界中,促进合作不仅需要谈判技巧,也需要修辞与说服技巧。例如欧洲联盟合作常常被主流舆论隐喻为“大家庭”或“政治婚姻”。这种大家庭的隐喻映射内容要点包括:(1)民族国家是一个人;(2)在政治上合作或联盟的两个国家就像“恋爱或结婚的人”,它们组建大家庭,合作的成果是该家庭的孩子。1997年部分欧洲国家通过了使用欧元货币的决定,围绕新货币的辩论中也充满着家庭隐喻。例如,将欧元描述为一个“孩子”,意味着将欧元区国家视为其父母。欧元的引入犹如欧元区的婴儿诞生,这种新生时刻带来希望与欢庆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隐喻修辞中,欧盟政治的协调性被展现出

来。尽管有评论指出“当英国的欧洲货币联盟德洛尔计划的替代方案——‘硬欧元’首次呈现在其未来的父母面前时,它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早产儿”。^⑨但早在1992年秋撒切尔夫夫人辞去英国首相职务时,她便使用了欧洲火车的隐喻:“火车已经离开站台,如果开错了方向,乘客就不会上去。”^⑩这里展示出英国认为“欧洲分裂成慢车道和快车道”的担忧,在一辆奔驰的列车(欧洲联盟)上乘客(欧洲国家)需要相互协调,确定最终的目的地。

(二)隐喻的认知启发效应

隐喻既可以作为过滤器,筛选出大部分可用信息,只留下与隐喻相一致的核心思想,将不同的信息折叠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信息包。^⑪当面对复杂的世界时,人脑会产生一套简化机制。为了应对信息过载,行动者会过滤掉大部分数据,只看到那些看起来重要并且与当前的思维方式一致的信息。根据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观点,“启发法”是一种日常心理“捷径”,可以快速确定核心线索,同时忽略外围信息。^⑫启发式思维追求速度,节约认知资源,但这样做是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的。^⑬隐喻的认知聚焦功能会在复杂环境下帮助观众节约认知资源,形成启发式认知捷径。当丘吉尔表达“铁幕降落到整个欧洲”的隐喻时,他就勾画出苏联与西方的敌对关系。这种“横跨欧洲的铁幕”很有画面感,犹如剧院里的幕布降临,将欧洲分裂开来。同样,当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谈到“在整个大陆上吹来变革之风”时,人们很容易认为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犹如大自然之风不能阻挡。^⑭

隐喻对于人类的思想和交流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一种嫁接概念的思维方式。但是隐喻的跨领域映射需要借助听众所熟悉的、共享的文化知识,其中一些是关于典型角色关系和民间常识(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火车和乘客关系)以及道德和实践规范和价值观(如父母的权威、婚姻的忠诚、火车按时间表离站)。^⑮莱考夫分析了美国政治思维所依据的世界观。在他看来,“家庭”隐喻处于美国政治概念体系的中心,这个概念体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使民众能够根据其对家庭的认知来推理国家形态,即将国家

理解成一个家庭,其中,政府是父母,公民是孩子。^⑦长期以来,美国政治话语的民族国家隐喻存在两个相互竞争的版本:严厉的父亲系隐喻模式和慈爱的母亲系隐喻模式。两种隐喻版本诱导出不同的道德信仰体系,进而产生“保守”和“自由”的世界观。此外,崛起国也注重通过象征性隐喻传递意图与形象信号,向国际社会传递启发式认知图像。例如2016年中国首次承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时,就利用主场外交积极对外展示和平大国形象。开幕式表演者在拼写“杭州”名字的同时,呈现出了一只蝴蝶的造型,这构建出一个隐喻:蝴蝶的“美丽”“多变”、转型飞翔,象征着杭州这座城市的浪漫情调、创新精神和未来希望。而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将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用“四叶草”的造型展示出来,并让各国国旗围绕着“四叶草”旋转,暗示“四叶草”是联结世界的中心。^⑧这种表达有助于展示中国的新面貌和对全球合作与和平的期许。

(三)竞争性的话语隐喻

政治话语中的隐喻竞争异常激烈,而那些最受广泛认可的隐喻往往决定了政治竞争的结果。^⑨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的支持者,也就是被喻为“鹰派”的人,经常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来证明继续军事努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行为体则被喻为“鸽派”,他们把越南战争称为“泥潭”,呼吁美国应尽快从中解脱出来。“鸽子”在圣经中的形象是嘴里叼着一片橄榄叶回到诺亚方舟,而这象征着洪水退却、和平重现。至于“鹰”则是捕食动物,隐喻那些强硬而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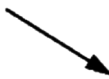
武力的政客。政治行动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都会将不同国家隐喻成不同动物,例如俄罗斯被称为“北极熊”、美国被称为“双头鹰”、印度被描述为“亚洲象”、中国则被视为“熊猫或龙”,还有些边缘国家例如朝鲜、利比亚和苏丹甚至被西方国家称为“流氓国家”。^⑩另一个深刻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隐喻是“多米诺骨牌”理论。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在处理苏联对西方的安全威胁时都深深受到“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换言之,竞争性环境下的政治决策者将受到隐喻惯性的制约。^⑪

在竞争性话语环境中,有悲观的“黑暗式”隐喻,也会有乐观的“光明式”隐喻。^⑫例如,当修辞者提到一艘船,听众的脑海中通常会自动激活有关船舶的话语:大海、航程、舵手、灯塔等等。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将“船舶”架构作为演讲中的核心隐喻。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一艘叫“太平洋探索者号”的游轮上举行的。习近平主席借景喻事,以“同舟共济”的成语,呼吁大家握稳舵盘、把准航向、齐力划桨、乘风破浪。“船舶”架构的深层隐喻体现中华文化中“亲仁善邻”“美美与共”“协和万邦”的道德观念,彰显出中国的责任与担当,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普惠共赢的真挚情感(见表1)。

当然,隐喻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对使用隐喻的修辞者既有帮助也有限制。因为虽然隐喻可能产生预期的修辞效果,但也可能诱导使用隐喻的修辞者自我约束。例如,“向毒品宣战”叙事会导致执法力度增强,甚至可能导致政府使用军队来拦截毒品运

表1

国际话语中的隐喻示例

		源域	映射	目标域
乐观情绪	正向隐喻	航船		全球命运共同体
		船桨、舵盘		世界经济、全球治理
		引擎		亚太经济、全球合作
		新旧动能		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
悲观情绪	负向隐喻	病毒、毒瘤		政治腐败、恐怖主义
		战争		新冠疫情、贫困
		陷阱		治理赤字、中美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输,逮捕和惩罚毒贩。这个隐喻还可以凝聚公众的支持与期待。然而,“毒品”作为非生命体自身永远不可能被打败,或被迫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这种拟人化的隐喻可能产生戏剧性的结果,使人们对“战争成果”产生期望,而一旦毒品不能被彻底“打败”而只是抓捕部分违法人员,就可能因毒品问题复发而产生持续的社会失望。^⑤

四、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隐喻想象

国际关系场域是集合叙事竞争的重要舞台,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政治隐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设想,二战后国际秩序将由“四位国际警察”来维持,即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自从罗斯福提出国家以警察身份维护国际秩序的想法以来,“世界警察”往往成为大国地位和角色的隐喻。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大,世界警察的隐喻开始变体为“美国牛仔”叙事和“国际警长”叙事。这些隐喻引发了人们对好莱坞西部片的记忆:美国边境警长的形象是一个孤独、强硬和务实的执法者形象。如果美国这一“警长”不能保护危险中的国家,那么世界对美国的期望也就会降低。此外,国际政治的抽象术语和逻辑也经常通过隐喻来表达。例如,“无政府状态”“系统”“结构”“均势”“系统效应”“层次分析”“胡萝卜与大棒”等隐喻都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⑥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隐喻表述

国际政治教材经常将世界隐喻为“台球桌”,而将国家想象为“台球”,这些图像有助于帮助读者形象地理解抽象的国际结构概念。^⑦结构现实主义也借鉴经济学的“无形之手”隐喻,认为国际行动者盲目无序的互动实际上会导致国际结构的涌现,这是一种强大的外生支配力,约束着所有行动者的选择。而且,自由主义学者也常常使用“网络”或“蜘蛛网”模型来描述国际社会的互动与相互依赖,将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隐喻为“鸟巢式的网络嵌套”。还有学者将国际体系隐喻为“大森林”,其中充满被喻为“树木”的同质国家。^⑧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约瑟夫·奈等人将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隐喻成“三维棋盘”,国家、超国家与次国家的行为体在不同棋盘层面相互作用。^⑨而阿查亚则使用“多元剧场”的隐喻,

揭示出霸权权力的有限性与国际关系的多元性现实:不同剧场中会有不同的主角与叙事,霸权并不能主导所有的剧场演出。^⑩

其一,“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叙事隐喻。霍布斯最早对原始“自然状态”进行了形象化隐喻,他将其假想为一种竞争螺旋支配下的敌意和暴力空间。^⑪隐喻性的“自然状态”是对“无政府状态”事实的具体化,更容易让读者与自己的亲身体验结合起来。在无政府结构的经典论述中,肯尼斯·沃尔兹认为结构需要关注“排序原则、功能区分和能力分布”三要素。^⑫对于排序原则,沃尔兹通过“自由市场”和“科层制权威”隐喻区分了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度。而杰克·唐纳利对沃尔兹的结构隐喻进行空间上的扩展,主张将单位进行“纵向”和“横向”区分,提出“垂直”分化概念,认为国家之间也存在等级位置差异。^⑬垂直分化是一种“相对位置或地位”,这被隐喻为一个阶梯式的上下空间分布。与之对应,“水平分化”的政治空间差异可以用“分割”或“区隔”隐喻,无政府状态可以被隐喻为一个空容器,没有内在的逻辑;不同的互动模式会向其中注入不同的内容,因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⑭科林·怀特进一步提出社会关系的“链接”和“嵌套”结构隐喻,暗示了结构的变动性。^⑮

其二,在外交实践中,隐喻话语成为展示意图与塑造信念的重要方式。当一个词或短语被一遍又一遍重复时,听众相应的神经回路也会被反复激活,最终使相关话语成为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印象。在分析冷战修辞时,埃德温·布莱克指出美国激进的右翼分子往往使用类似于“共产主义癌症”的负面隐喻,这种极端隐喻差点把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⑯与之关联,冷战各方通过选择各种非文明化的词汇,将对方描述为非理性、强制性和攻击性的可怕国家。例如,美国政客大多把苏联人说成是“北极熊”“豺狼”“危险的掠食者”,或者说成是“原始人”“野蛮人”“没有头脑的机器”“疯子”“狂热分子”“上帝的敌人”。^⑰

(二)历史类比与隐喻

危机中的决策者会依据类似情况作为参考,或

习惯性使用过去“教训”类比当前情景。类比推理的决策者往往依赖历史记忆,在历史类比中聚焦观众注意力。例如,美国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概念为理解“9·11”事件和美国的战略叙事提供了一个隐喻模版,其不仅将“反恐”隐喻为“战争”,而且为武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了合法性说辞。在福柯的术语中,小布什的“反恐战争”叙事是一种权力表演形式,背离了真相。^⑧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发表的三次重要演讲——2001年9月11日晚对国家的电视讲话、9月12日在白宫会见国家安全小组后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以及在9月14日全国祈祷和纪念日的讲话,均使用了隐喻。例如“狩猎隐喻”将恐怖主义“敌人”描述为需要被猎杀或“猎食”的动物,表明了美国“追捕恐怖分子”的决心。小布什政府的政治隐喻将“9·11”事件描述为敌人的宣战,因此对其唯一合乎逻辑的回应就是发动反击。

一方面,通过隐喻,反对者被定位为意识形态的敌人。通过“他者威胁”修辞和“十字军东征”隐喻,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修辞强调昨日“他者”与今天“他者”的联系,这种联系被整合进一个连贯的宏大战略叙事之中。^⑨引人瞩目的“十字军东征”隐喻强化了历史想象与政治修辞的穿透力。2001年9月16日,当小布什把他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描述为一场“十字军东征”时,反恐战争的意义前所未有地改变了。^⑩这种“十字军东征”的隐喻似乎是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观的再现。^⑪小布什宣称:“在每一代人中,世界都产生了人类自由的敌人。他们攻击了美国,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家园和捍卫者,而我们父辈的承诺如今成为我们的责任……基地组织是所有恐怖意识形态的继承人,通过牺牲人类的生命来服务于他们的激进观点,他们会沿着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一直走到尽头,我们要将其埋葬到无名的坟墓里。”^⑫小布什的战略叙事将恐怖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极权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将“反恐战争”上升到意识形态,甚至文明冲突的高度。在小布什的演讲中,“反恐战争”不再是一场传统的热战,而是“意识形态斗争”,充满非黑即白的道义性。^⑬

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隐喻的质疑者反对把伊拉克和反恐斗争混为一谈。批评人士经常使用越南战争的类比,认为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陷入了一个“泥潭”,类似于美国卷入越战,这是美国集体记忆中的痛苦时刻。^⑭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肯尼迪宣称伊拉克是“小布什的越南”,在这里“越南隐喻”将不断扩大的反恐战争理解成一种混乱、悲惨和不必要的冲突。^⑮在2004年4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小布什总统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越战隐喻是错误的。”^⑯他强调,越南战争不是一场被视为“泥潭”的干涉战争,而是一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战争。正如“9·11”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恐怖分子在世界另一边的安全庇护所里竟然可以给美国的城市带来死亡和破坏。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在海外击败他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美利坚合众国面对他们。^⑰小布什版的“越战隐喻”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想保护美国的安全,就应该支持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与之不同的是,“十字军东征”隐喻传递的是更深层次的道德修辞与信仰:“作为民主的灯塔,我们要改造极端主义思想”。^⑱

五、结语

政治剧本需要话语台词,政治互动离不开修辞沟通。政治实践中的隐喻话语展示着主观认知与情感承载。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隐喻,政治家往往会将嵌入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历史神话、典故文本或历史事件,与当下的政治现实对照。根据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隐喻提供一种启发式认知,简化认知方式、意义填充、选择性框定,并且促进安全化进程,成为重要的政治话语武器。特别是在不确定情况下,政治隐喻基于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解释,构建了生动性联想,将有力塑造政治进程的想象力。更进一步,作为情感凝聚工具,隐喻构建了精心制作的认同性叙事,促进或限制政治实践的合法性。

政治互动进程离不开话语叙事及其隐喻修辞手段的运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形象关联是提升叙事说服力的关键。本文系统分析了政治隐喻的概念内涵、话语功能、叙事表达模式与理论根基,为国际

关系的话语理论创新与反思提供了基础。传统政治文献大多关注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忽视隐喻建构的多维度分析。作为重要的政治话语武器,隐喻功效塑造着公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认知判断。基于此,未来如何进一步反思与创新政治隐喻理论,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发展需要,是学界需要思考与回答的时代性课题。

注释:

① Tongtao Zheng,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Language Rhetoric: Tactics of Gaining Public Support and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http://www.immi.se/intercultural/nr4/zheng.htm>.

② Federica Ferrari, *Metaphor and Persuasion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3 ~ 6.

③ Sonja K. Foss and Cindy L. Griffin, "Beyond Persuasion: A Proposal for an Invitational Rhetoric,"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62, No. 1, 1995, p. 3; Michael Calvin McGee, "A Materialist's Conception of Rhetoric," in Barbara A. Biesecker and John Louis Lucaites, eds., *Rhetoric, Materiali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2010, pp. 17 ~ 42; Celeste M. Condit, "Race and Genetics from a Mod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94, No. 4, 2008, pp. 383 ~ 406.

④ Kurt Braddock, *Weaponized Words: The Strategic Role of Persuasion in Violent Radicalization and Counter-Radic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9 ~ 40.

⑤ 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叙事研究的代表文献有: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2000, pp. 1 ~ 39;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s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2001, pp. 47 ~ 80.

⑥ Elena Semino, *Metaphor in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0.

⑦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50.

⑧ 另一类释放昂贵信号的方式是“沉没成本”战略,即投入大量前期成本使撤销承诺对自己变得不利。参见 James D.

Fearon, *Threats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2;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张廖年仲:《敌对国家建立互信之研究:昂贵信号模式》,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⑨ Andrew Kydd,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2000, p. 333.

⑩ 参见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Alpo Rusi, "Image Research and Image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forma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 the Televisio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3, No. 1, 1988, pp. 29 ~ 42; Noel Kaplowitz, "National Self-Images, Perception of Enemies, and Conflict Strategies: Psychopolitical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1, No. 1, 1990, pp. 39 ~ 82; Richard K. Hermann et al.,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3, 1997, pp. 403 ~ 433.

⑪ 参见 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 eds., *Forging the World: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⑫ 参见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第51 ~ 79页;许晋铭、曹德军:《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叙事及其影响机制探析》,《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8期,第26 ~ 34页。

⑬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39 ~ 75.

⑭ Michael C. Williams, *Culture and Security: Symbolic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33.

⑮ Michel Foucault et a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16.

⑯ 转引自 Celeste M. Condit, "Race and Genetics from a Mod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94, No. 4, 2008, pp. 383 ~ 406.

⑰ Ronald R. Krebs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1, 2007,

pp. 35 ~ 66.

⑮ Richard Jackson, *Writing the War on Terrorism: Language, Politics and Counter-Terror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

⑯ Kevin L. Kliesen, Brian Levine and Christopher J. Waller, "Gauging Market Responses to Monetary Policy Communic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Second Quarter, 2019, pp. 69 ~ 91.

⑰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p. 225 ~ 254;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Charlotte Epstein, *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irth of an Anti-whaling Discour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⑱ Herbert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9.

⑲ Dan P. McAdams, "Can Personality Change? Levels of Stability and Change Across the Life Span," in T. F. Heatherton and J. L. Weinberger, eds., *Can Personality Change?*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4, p. 306.

⑳ Andrew Geddes, "Britain, France, and EU Anti-Discrimination Policy: The Emergence of an EU Policy Paradig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7, No. 2, 2004, pp. 334 ~ 353.

㉑ 例如,通过领导人演讲、纪念活动、教科书编写等方式都有助于展示连贯的战略叙事,从而强化集体认同。参见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4。

㉒ 贺刚:《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的演变: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的比较研究》,《欧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5页; Erik Ringmar, "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1, 2012, pp. 1 ~ 25.

㉓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1992, pp. 22 ~ 23.

㉔ Federica Ferrari, *Metaphor and Persuasion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ustainable Perspective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8; Lin Alexandra Mortensgaard, "Contesting Frames and

(De)Securitizing Schemas: Bridging the Copenhagen School's Framework and Framing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3, 2020, pp. 140 ~ 166;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06 ~ 131页;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19 ~ 43页。

㉕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Community Trap: Liberal Norms, Rhetorical Actions and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1, 2001, pp. 47 ~ 80.

㉖ James P. Morris et al., "Activation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 Psych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ot Cognition Hypothe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 No. 4, 2003, pp. 727 ~ 745.

㉗ Robert C. Rowland and Robert Strain, "Social Function, Polysemy and Narrative-Dramatic Form: A Case Study of Do the Right Thing,"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42, No. 3, 1994, pp. 213 ~ 228.

㉘ 国晓光、弓联兵:《中国政治语言中的数字修辞:一种政治传播学的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0页。

㉙ 转引自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4, p. 14。

㉚ [美] 乔治·莱考夫:《隐喻的现代理论》,载[德] 德克·盖拉茨主编, 邵军航、杨波译:《认知语言学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 ~ 204页; 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85 ~ 112页。

㉛ [英] 特伦斯·霍克斯著, 高丙中译:《论隐喻》, 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页;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颜一译:《修辞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67页。

㉜ [美] 乔治·莱考夫、[美] 马克·约翰逊著, 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 ~ 4页。

㉝ Raymond W. Gibbs Jr.,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Zoltán Kövecses,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llen Winner, *The Point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陈静:《阿拉伯各国国歌中的隐喻认知》,《江淮论坛》2013年第5期,第173 ~ 177页。

③⑦黄华新:《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48~63页;纪玉华、陈燕:《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42~48页;John Wilson,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Cambridge, MA: B. Blackwell, 1990; Jack Lule, "War and Its Metaphors: News Language and The Prelude to War in Iraq," *Journalism Studies*, Vol. 5, No. 2, 2004, pp. 179~190。

③⑧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0; George Lakoff,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2/3, 1991, pp. 25~32; Rainer Hulse and Alexander Spencer, "The Metaphor of Terror: Terrorism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6, 2008, pp. 571~592。

③⑨Gerard J. Steen, W. Gudrun Reijnierse and Christian Burgers, "When Do Natural Language Metaphors Influence Reasoning? A Follow-up Study to Thibodeau and Boroditsky," *PLoS One*, Vol. 9, No. 12, 2014; Jeffery Scott Mio, "Metaphor and Politics," *Metaphor and Symbol*, Vol. 12, No. 2, 1997, pp. 113~133。

④⑩转引自 Megan Foley, "Peitho and Bia: The Force of Language," *Symploke*, Vol. 20, No. 1~2, 2012, pp. 174~175。

④⑪Steven Pinker,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1994, p. 1。

④⑫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④⑬Nicole Möller, "Cognitive Metaphor and the 'Arab Spring'," in Frank Polzenhagen and Stefanie Vogelbacher, ed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in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New York: Peter Lang, 2014, pp. 133~144。

④⑭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④⑮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506。

④⑯Zoltán Kövecse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in Frank Polzenhagen and Stefanie Vogelbacher, ed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in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New York: Peter Lang, 2014, p. 30。

④⑰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l Discourse*, trans. George A. Kenn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x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41。

④⑱A. W. Coats, "Economic Rhetoric: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in Arjo Klammer, Donald N. McCloskey and Robert M. Solow, eds.,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hetor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4~75。

④⑲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5。

⑤⑩[德]赖纳·许尔森:《论隐喻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以欧盟扩大为例》,《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第15~22页;林民旺:《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国际论坛》2007年第2期,第3页;Fred Chernoff, *Theory and Meta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s and Contending Accoun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36。

⑤⑪Philip Eubanks, *A War of Words in the Discourse of Trade: The Rhetorical Constitution of Metaphor*,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5~19。

⑤⑫Jonathan Charteris-Black, *Politicians and Rhetoric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29。

⑤⑬Anna De Fina, Deborah Schiffrin and Michael Bamberg,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⑭Adam Fairclough,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War in Vietnam," *Phylon*, Vol. 45, No. 1, 1984, p. 38。

⑤⑮S. Daniel Lucks, "Martin Luther King, Jr. 's Riverside Speech and Cold War Civil Rights," *Peace & Change*, Vol. 40, No. 3, 2015, pp. 395~422。

⑤⑯Martin L. King, Jr., "Beyond Vietnam," <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mlkatimetobreaksilence.htm>; C. Carso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8。

⑤⑰Adam Fairclough,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War in Vietnam," *Phylon*, Vol. 45, No. 1, 1984, p. 38。

⑤⑱Robert L. Ivie, "Argument from Similitude in Martin Luther King, Jr.'s Deliberative Dissent from War," *Argumentation*, Vol. 34, No. 1, 2020, pp. 311~323。

⑤⑲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

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 211, No. 4481, 1981, pp. 453 ~ 458.

⑥ Erin Steuter and Deborah Wills, *At War with Metaphor: Media, Propaganda, and Racism in the War on Terror*,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8; Keith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1994, p. 655.

⑦ Michael Erard, "Frame Wars," <https://www.alternet.org/election04/20537/>.

⑧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4, pp. 52 ~ 54.

⑨ Andreas Musolff, "Metaphors and Trains of Thought: Spotting Journey Imagery in British and Germa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ue Wright, Linda Hanrais and Jolyon Howorth, eds., *Language, Politics and Societ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p. 100 ~ 109.

⑩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204.

⑪ Jeffery Scott Mio, "Metaphor and Politics," *Metaphor and Symbol*, Vol. 12, No. 2, 1997, p. 130.

⑫ David Zarefsky, *Public Speaking: Strategies for Succes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2002, p. 276.

⑬ Mark Turner and Gilles Fauconnier, "Metaphor, Metonymy, and Binding,"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2000, p. 135.

⑭ Zoltán Kövecses,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0.

⑮ Kevin Rudd, "A Maritime Balkans of the 21st Centur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3/01/30/a-maritime-balkans-of-the-21st-century/>.

⑯ Robert D. Kaplan, *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 15.

⑰ Jan Sebera and Wei-lun Lu, "Metaphor as a(De)legitimizing Strategy in Leadership Discourse: The Language of Crisis in Winston Churchill's Cold War Speeches," in Jana Pelclová and Wei-lun Lu, eds., *Persuasion in Public Discours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

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pp. 65 ~ 78.

⑱ Andreas Musolff, *Metapho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tical Reasoning in Debates about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21.

⑲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 p. 10.

⑳ Jeffery Scott Mio, "Metaphor, Politics, and Persuasion" in Jeffery Scott Mio and Albert N. Katz, eds., *Metapho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arlbaum, 1996, p. 130.

㉑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0, No. 4, 1973, pp. 237 ~ 351; Paul Slovic et al., "The Affect Heuristic,"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 177, No. 3, 2007, pp. 1333 ~ 1352; George F. Loewenstein et al., "Risk as Feel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7, No. 2, 2001, pp. 267 ~ 286.

㉒ Joh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 87.

㉓ Jonathan Charteris-Black, *Politicians and Rhetoric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5.

㉔ 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ndrew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02 ~ 251.

㉕ George Lakoff, *Moral Politics: What Conservatives Know That Liberals Don'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154 ~ 155.

㉖ Yue Guan and Charles Forceville, "Making Cross-Cultural Meaning in Five Chinese Promotion Clips: Metonymies and Metaphor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Vol. 17, No. 2, 2020, pp. 123 ~ 149.

㉗ Seth Thompson, "Politics Without Metaphors is Like a Fish Without Water," in Jeffery Scott Mio and Albert N. Katz, eds., *Metaphor: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arlbaum, 1996, p. 187.

㉘ Tim Niblock, "Pariah States" and Sanc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raq, Libya, Suda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1.

㉙ Robert L. Ivie, "Cold War Motives and the Rhetorical Metaphor: A Framework of Criticism," in Martin J. Medhurst et al., eds., *Cold War Rhetoric: Strategy, Metaphor, and Ideology*,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2.

㉚ Michael Osborn, "Archetypal Metaphor in Rhetoric: The Light-Dark Famil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53, No. 2,

1967, pp. 115 ~ 126; Michael Osborn, "Rhetorical Depiction," in Herbert W. Simons and Aram A. Aghazarian eds., *Form, Genr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6, pp. 79 ~ 107.

⑤ Thomas R. Burkholder and David Henry, "Criticism of Metaphor," in Jim A. Kuypers, ed., *Rhetorical Criticism: Perspectives in Actio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9, pp. 102 ~ 104.

⑥ 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aphors, Myths and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0.

⑦ Walter C. Opello, Jr. and Stephen J. Rosow, *The Nation-State and Global Order: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9, p. 226.

⑧ John W. Burton,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5 ~ 45.

⑨ 参见[美]约瑟夫·奈、[加]戴维·韦尔奇著, 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⑩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New York: Polity, 2014, pp. 3 ~ 10.

⑪ Paul A. Chilton,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6, pp. 16 ~ 19.

⑫ 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⑬ Jack Donnelly, "Rethink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From 'Ordering Principles' to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 No. 1, 2009, p. 51.

⑭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 ~ 42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0 ~ 60.

⑮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5.

⑯ Edwin Black, "The Second Person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56, No. 2, 1970, pp. 109 ~ 119.

⑰ Eugene E. White, "Rhetoric as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 in Eugene E. White, ed., *Rhetoric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 ~ 20.

⑱ 转引自 Adam Hodges, *The "War on Terror"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station of Sociopolitical Re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9 ~ 30.

⑲ Ruth Wodak et al.,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Second Edition), trans. Angelika Hirsch et. 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09, pp. 16 ~ 21.

⑳ Lars Lundsten and Matteo Stocchetti, "The War Against Iraq in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in Stig A. Nohrstedt and Rune Ottosen, eds., *Global War—Local Views: Media Images of the Iraq War*, Göteborg: Nordicom, 2005, pp. 25 ~ 46.

㉑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 ~ 28.

㉒ George W. Bush,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Day of Prayer and Remembrance at the National Cathedral," Washington, DC, 2001, September 14.

㉓ George W. Bush, "Prime Time Address to the Nation from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2001, September 11.

㉔ Chuck Raasch, "Escalating Violence Makes Iraq/Vietnam Comparison Inevitable," *USA Today*, April 9, 2004.

㉕ Joby Warrick, "Banned Weapons Remain Unsee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 2003; Howard Schneider, "Chairmen Urge Bush to Follow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7, 2006.

㉖ Chuck Raasch, "Escalating Violence Makes Iraq/Vietnam Comparison Inevitable," *USA Today*, April 9, 2004.

㉗ Adam Hodges, *The "War on Terror"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station of Sociopolitical Re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3 ~ 140.

㉘ Robert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44.